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九六期 ——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04f)

【读史笔记】	清华大学红卫兵活动梗概	陈益南
【史海钩沉】	任白戈“文革”蒙难记	何 蜀
【往事如烟】	太阳熄灭了一半	陈向阳
【前事不忘】	无处忏悔	陈焕仁
【书刊评论】	不应有的“整理”——读陈焕仁《红卫兵日记》有感	何 蜀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读史笔记】

清华大学红卫兵活动梗概

• 陈益南 •

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全国红卫兵运动来龙去脉的一个缩影。本文根据沈槐如、唐少杰等人的文章与其他相关资料，特将这个“缩影”作了一个整理，供欲了解那段历史的读者，予以参考。

(1) 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广播。6月4日，清华大学内以刘涛（刘少奇与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儿）为代表的学生贴校党委的大字报；6月9日，高教部长张际春宣布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蒋南翔是“黑帮”；即日，以叶林为首的工作组513人进驻清华大学，接管校内一切大权。

(2) 6月9日—6月23日，工作组执政领导批判斗争校内“黑帮”，即斗学校党委领导与老师中的“黑帮”分子。之中，工作组欲以传统方法、以一层层党组织领导而组织进行揭批“黑帮”即清华原党委，但很多学生则自发贴大字报与揪斗“黑帮”，因有北大聂元梓自发贴大字报一事样榜的鼓舞。

（3）6月16日，工程化学系92班学生蒯大富贴出《工作组往何处去？》的大字报，认为工作组压制了学生揭批“黑帮”的运动。

（4）6月24日，工作组召开了辩论大会，并提出了“反蒋（南翔）必先反蒯（大富）”的方针，认为蒯大富是想夺清华大权的右派分子。但是，辩论大会不仅没有孤立蒯大富，反而激起了广大学生的反感，纷纷贴起了工作组的大字报。

（5）北大6·18事件的影响：北京大学化学系、生物系学生，趁机工作组开会外出时，自发批斗了学校40多名校领导、教师及二名学生干部。此事被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定为反革命事件。6月19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批转了北京新市委有关北大6·18事件的简报，要各地均照此精神办事。

（6）6月24日后，工作组将蒯大富等700多名学生打成反革命。在此短时间内，工作组在清华大学实施了高压政策。期间，薄一波二次到清华大学讲话，说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

（7）7月23日、25日、26日，北京大学召开三天全校师生大会，辩论工作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及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部参加了这场辩论大会。陈伯达在会上宣布，北大6·18事件不是反革命，而是革命事件。

（8）7月29日，北京市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革大会，宣布撤消工作组。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就派工作组一事作了检查。

（9）从7月27日开始，清华大学掀起了反工作组的浪潮，指责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央下令撤离工作组后，指定各系文革会主任联席会议代行校文革临时筹委会大权，领导清华的文革运动。刘涛担任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临筹）代表。

（10）7月29日晚，作为工作组成员的王光美到清华大学，参加工作组问题的辩论大会。

（11）8月4日晚，周恩来到清华参加全校大会，宣布工作组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宣布为蒯大富等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并要求学生矛头一致对准蒋南翔与清华原党委。

（12）8月7日，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临筹）向全校发出建议，建议按周总理的指示，全校学生团结一致对敌，即对准蒋南翔与校党委以及所谓“黑帮”。此为“八·七建议”。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临筹）是以刘涛等高干子女为领导与核心。

（13）8月8日，工化系学生、烈士子弟唐伟、陈育延、朱德明、吴楠等，发起成立“八·八串连会”，反对（临筹）的“八·七建议”，继续批判工作组。

（14）8月9日，在王光美建议下，“临筹”成立了“八·九串连会”，亦称“立即打黑帮串连会”，强调打黑帮，而不理会工作组问题。随后8月15日，他们批斗了校党委第一副书记艾知生。

（15）当时的态势，“八·九串连会”成员是多数，“八·八串连会”则是少数。“八·八串连会”是当时清华文革成立最早的群众政治组织之一，后被称为“八·八”派；但是，“八·八”派当时虽反对工作组，却又对为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和学生进行平反之事不很积极，没有为此采取过什么行动。故它虽反对“八·九”贵族，却又并不激进。

(16)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并写了三论“革命造反有理”的大字报，而得到毛泽东于8月1日的回信赞扬支持。8月5日，刘涛等成立了“清华大学自控系红卫兵”。这是清华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17) 8月18日后第一天，即8月19日，在“自控系红卫兵”基础上，“八·九”派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但是，这个被称为“八·九红卫兵”的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却只吸收革命干部与革命军人的子弟参加，普通的工农子弟都不能参加。

(18) 8月22日，“八·八”派也成立了红卫兵，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因传毛泽东不同意毛泽东主义一说，便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19) 8月19日，“八·八”派的唐伟、陈育延以《向日葵》的名义张贴了质问王光美的大字报。紧接着，“八·九”派的贺鹏飞、刘涛也贴出了《三问王光美》的大字报。贺鹏飞的父亲是贺龙元帅。8月22日，唐伟等贴出刘少奇的大字报。

(20) 8月24日，“八·九”派的清华红卫兵串连12个高校的红卫兵2000余人，由贺鹏飞率领，于下午5时，突然进入清华园，驱散正在开大会的“八·八”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抄录所有贴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内容及其作者姓名，有的进行拍照，最后又撕毁全部这一类大字报，并占领学校广播室，广播《安民告示》与《最后通牒》，声称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对清华想翻天的右派要进行镇压。下午6时，12所高校红卫兵还砸毁了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并且强迫学校内的中上层领导干部、“黑帮”分子来搬卸二校门的石块，还连夜抄了一些黑帮的家，实行红色恐怖。现在很多人所熟悉的那张红卫兵砸清华大学校门的历史照片，纪录的就是这件事。不过，人们一般都没有注意这些红卫兵是由什么人构成。

(21) “8·24”后，清华大学便由贺鹏飞、刘涛为首的“三临”——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文革临时筹委会、文革临时主席团——控制，9月16日召开的校文革代表大会二次大会，决定成了了文革临时主席团。

(22) 校文革临时主席团成立后，重点就是斗“黑帮”。而“八·八”派则仍揪住院工作组不放，矛头直指刘少奇。但当时，“八·八”派力量尚弱，在与“三临”的斗争中常处被动。

(23) 9月24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成立。9月23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接见了蒯大富，对蒯大富单独成立自己一派红卫兵的想法，给予了鼓励。当时仅有十几人的井冈山红卫兵发表了一系列声明，提出了三大口号：批判工作组的资反路线，批判清华大学红卫兵，为“蒯式人物”（被工作组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师生在当时的称呼）平反。自此，清华大学便有了三大红卫兵组织：

- 由高干子弟贺鹏飞、刘涛等为核心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
- 以烈士子弟唐伟、陈育延为首的、较平民化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 由被工作组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学生为核心、并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

请注意，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成立的时间是9月24日，而此前的8月期间在北京市批斗老舍等文化名人，打、杀所谓“黑五类”分子，焚书、“破四旧”、毁文物的红卫兵，并非这类“造反派”红卫兵，而多是贺鹏飞、刘涛等为核心的那些高干子弟红卫兵所为。

(24) 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的成立，使清华学生团体出现了一次大分化大改组。“八·八”派的

唐伟、陈育延不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右倾”，从中拉出一支队伍，另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

（25）10月9日，清华井冈山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联合行动，组织了几百人到城里静坐示威，向中央要求，要王光美到清华做检查。第二天，王光美就将一份书面检讨送给了清华。实际上，8月22日清华大会中，贺鹏飞第一个当着与会的周总理的面，就要求王光美回清华作检查。

（26）12月19日，清华三大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联合，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井冈山兵团”，蒯大富为“司令”。此时，清华园内其他造反派红卫兵小组织基本解散，或加入“井冈山”。“井冈山兵团”基本控制了清华大学。

兵团的正式领导机构是总部委员会，蒯大富、韩银山、鲍长康、马小庄、刘才堂、陈育延、陈继芳、任传仲、王良生任常委，后来是四一四派领导人之一的孙怒涛曾任过常委。除韩银山为原行政处干部，全部常委皆为在校学生。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之前，至少在团派与四一四派真正形成对峙格局之前，兵团总部实际上临时负责清华大学的日常领导工作。总部下辖总部办公室、作战部（又称一部）、政治部、后勤部等常设部门，每一部门都由其核心组负责领导工作。总部办公室设有秘书组、电话组、常务组、资料组。

作战部设有对内作战部和对外作战部，前者辖部队办公室、发放组、保卫组、三办（专案）、斗蒋兵团、大行动组、大批判组等；后者辖办公室、社会调查组（又称动态组，分为一“兵团动态”、二“校内及四一四动态”、三“首长讲话及北京动态”、四“中学动态”、五“运事动态”、六“国际动态”六个小组）、全国联络站（办公室、资料组、东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北组等）。政治部设有办公室、宣传部、学生工作部、教工工作部、二办（干部办公室）、组织部等。后勤部设有办公室、科技组、财务组、生活组。

根据情况需要，兵团还设置一些应急机构，如文攻武卫指挥部、“卢文李饶”专案组、吕应中专案组、斗批改联络站、遵义学习班（学生学习班分部）、平型关学习班（干部学习班分部）、战地宣传队等。

兵团的组织建制是把各系、处等单位按军事编制划为〇一至十五部队（一度扩为二〇部队），各部队由若干战斗组构成。这些以革命术语或红色词句（如“契卡”、“刺刀见红”、“指点江山”等等）命名的战斗组由人数不等、关系相对松散而志向相同的成员组成。兵团的群众性组织主要有以学生为主的28团、以职工为主的“清华大学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等。

兵团的宣传机构有《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广播台、前哨广播台、井冈山通讯社、井冈山杂志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等，主要由兵团宣传部负责。兵团在不同时间、不同范围出版发行的刊物有“井冈山报”、“井冈山杂志”、“井冈山通讯”、“文化大革命简报”、“学习资料”、“理论批判”、“整风简讯”、“大字报选”、“内部资料”以及各动态组的有关动态等。这些刊物是由兵团总部的不同部门主办的，其中有的刊物不仅信息量大、选题广、而且在当时的北京及外地颇有影响。如，刻板油印的“井冈山通讯”在其发行的一年半左右，共出版了近千期，而且往往是一日数期，内容包括内到外、中央兼地方、工农商学兵几乎各界的文革情况和动态。这些刊物表明，兵团重视信息情报的收集、整理工作，特别重视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及有关负责人的讲话、指示，力图通过自己的刊物所造的舆论声势来加强自己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还表明，兵团在建有较健全的政治、宣传等机构的同时，也拥有较发达的、辐射全国的情报机构，这在当时的群众组织中是极为少见的。

（27）12月25日，蒯大富率清华大学5000多红卫兵游行到天安门广场，率先喊出“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即著名的文革“12·25行动”。

（28）因事先对“12·25行动”有不同意见，唐伟、朱德明、许胜利三名兵团总部委员宣布退出总部；并于1967年1月2日单独另组了“毛泽东思想纵队”（仍属兵团内）。而1月4日，原与唐并肩战斗的陈育延贴出大字报，指责唐伟的分裂是个人主义。1月5日，于上年12月24日由蒯大富观点的铁杆人员组成的“二十八团”，将唐伟等抨击为资反路线在革命队伍中的代言人。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分裂开始了。

（29）1月6日，发生井冈山兵团部分学生谎称刘少奇女儿刘亭亭车祸事，将王光美骗至医院并予以劫持到清华，进行了七个小时的批斗。史称“1·6行动”。

（30）“1·6行动”加剧了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分裂。1月7日，井冈山兵团内进行公开大辩论，由唐伟的“毛泽东思想纵队”对“二十八团”。这次辩论，使相当多的人站到了“纵队”一方，并且，新成立了一批支持唐伟的“纵队”：如八八纵队、东方红纵队。与唐伟的纵队一起，被合称为“三纵队”。后来又出现了“毛主席警卫团”、“天安门纵队”等新组织，支持三纵队。这些力量，就是后来清华井冈山兵团内反蒯的“四·一四”派来由。

（31）清华大学在进入1967年直至1968年7月底工人宣传队进驻，该校的文革运动实际上已演化为清华井冈山兵团内部的兵团派，与四一四派的派战。

从性质上说，团派属造反的激进派，而四一四属造反派的右翼。从实力上讲，团派较强，四一四偏弱。但是，由于在1968年4月之前，只是文攻大字报与口水战，所以，团派也对四·一四派没办法。当时旧矛盾即对保守的“八·九串连会”、“三临”，已以造反派的胜利而结束，又没有其他新的派系矛盾产生，于是“兵团派”与兵团内部的“四·一四”便成了清华园的主要文革矛盾。

蒯大富既没能统一清华园的红卫兵，而持久的派战在武斗中也未能取得绝对控制权，于是最终引发了1968年7月27日工人宣传队的介入，致使蒯大富被迫退出文革政治中心，并遭抛弃。

四·一四派（后以沈槐如为首）本身也并没有获胜，它的胜利不是在其本身，而是在于它将原本已基本获得清华文革胜利果实、大权在握、且很有发展上进机会的蒯大富及其井冈山兵团，在同归于尽中（引来了工人宣传队）给拖垮了。

（32）1967年4月14日晚，清华大学反蒯的“三纵队”等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四·一四革命串连会”，正式公开宣告“四·一四”派的产生。5月29日“四·一四革命串连会”改组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沈槐如为首等七人组成414总部委员会。“四·一四”派虽然直到最后都还挂着清华井冈山的牌子，但实际已是与蒯大富的兵团派形同水火。

（33）1967年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前后，北京的北大、北航、北师大、地院等几大院校都已成立了革委会，唯独清华无法成立，原计划5月30日成立革委会，也给“四·一四”派搅了，直到最后1968年7月底蒯大富被工人宣传队包围，清华的革委会也没有能成立起来。

（34）1月4日，清华首次发生大规模流血武斗，双方各出动数十人的专业武斗队伍。

（35）1月24日中央批湖南“省无联”，使“四·一四”派大为高兴，因为他们认为蒯大富对文革的看法是“省无联”观点，故天天广播中央1月24日的接见内容。湖南“省无联”的重要理论代表作，即尚是中学生红卫兵的杨曦光所写的《中国向何处去？》。杨曦光即是前二年英年早逝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

（36）“团派”的教师造反组织“红教联”为陈里宁平反，但是，中央康生等在1968年3月仍认定为陈里宁平反是反革命事件，结果导致“红教联”头头陶德坚（女）挨整。团派也不得不开除“红教联”。

（37）1968年1月19日，军队派人进入清华检查；2月13日，由40人组成的军宣队正式进驻清华。

（38）1968年三月，“四·一四”派进行“倒谢（富治）的行动”，他们认为谢是蒯大富的强大后台之一。

（39）4月23日，清华的百日武斗拉开序幕。“团派”发动进攻“四·一四”派重要据点学校科学馆，以求解救被“四·一四”派关在里面的支持团派的电机系党总支书记。

（40）开始，中央采取毛泽东的方针，对待清华发生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即“四不方针”。

（41）4月29日，“四·一四”派一个学生死于团派的汽车轮下，此为清华武斗的第一名死者。

（42）“团派”方面有人开枪。此为北京高校武斗中，第一次用真枪进行武斗。

（43）7月4日、5日、6日和18日，“团派”方面分别打死“四·一四”派方面1人，共4人。

（44）清华百日武斗的结果是：师生共死12人，残30余人，伤数百人。

（45）7月27日上午，三万多名工人及少数解放军组成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制止武斗。被“团派”围困的“四·一四”派由此获得解救，他们立马向工人宣传队缴出武器，撤出“阵地”。“团派”则与工人发生流血冲突，赤手空拳只有语录本的工人在“团派”的攻击下，死5人，伤731人。因此，“团派”陷入了数万工人的包围之中。

（46）7月28日凌晨三点，毛泽东突然在人大会堂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蒯大富直到早七点，才从清华脱身，参加接见。

（47）7月29日，北京市革委会与卫戍区给中央的报告中，关于清华的武斗情况时称：我们已注意，“四·一四”想利用此事做文章，坏人想挑拨工人和团派的关系。

（49）但是，8月5日，毛泽东将巴基斯坦外宾送的芒果转送给工人宣传队。形势便发生了逆转。

（50）8月15日，毛泽东接见了工人宣传队的代表。

（51）8月16日，工人宣传队要求清华两派组织都撤消，成立联合的“红代会清华井冈山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并且，宣布长期驻在清华大学。

（52）8月26日，经毛泽东指示与修定的文章，即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工人宣传队长期占领学校成为了文革中的一个方针。

（53）毛泽东与中央文革以及北京市谢富治等，无疑是支持蒯大富这个全国头号造反派的，可是蒯大富没能统一清华，毛泽东也没办法，二次派进去军队人员，也无法结束清华两派的斗争，最后，毛泽东只好动用工人，三万多工人以宣传队的名义开进清华，强行包围攻解决清华两派的武斗，并让工宣队长驻清华，从而使清华大学变成了由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领导之下。

（54）能说会道的蒯大富，凭着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等强大背景的支持，又有众多清华红卫兵的拥护，但却在长达一年半以上的时间里，没能压倒对方、统一清华，这之中，一方面暴露了蒯大富的统帅才能，尚不足以担负大任。实际上，在文革中，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战，没有仅凭“文攻”就可以战胜对方的，知识分子思维中，是各有各的道理，所谓以理服人的事，是不存在的，道理只能争取局外人，而并不能说服敌对者。相反，压服才是历史的真实。虽然被压者也并不服，但那种不服却只能存在于内心了，而不能对实际局势再有多大作用。蒯大富没能压倒“四·一四”派，而竟长期被“文攻”、说理的方式支配，直到最后才动起了武，可是，当时文革的进程却已不允许他这样做了，最后，导致失败。

（55）但毛泽东是如何决定、如何派几万名工人进驻清华大学，以及他是如何改变了扶持蒯大富的态度，而让工人介入学校的详情，至今不知。

（56）毛泽东在1976年初的讲话中，说到蒯大富时，说“青要好的，不要聂元梓、蒯大富那样的”。他这样不再看好蒯大富，否定蒯大富，并非否定造反派代表人物，相反，王洪文却得到了他的特别青睐。应该说，毛泽东是认为蒯大富没有王洪文用武斗攻打“上柴联司”以求上海统一时的那种气魄，不具领袖才能，又有时不听中央招呼，后来才否定他的。

□ 2006年3月2日修定

~~~~~

## 【史海钩沉】

### 任白戈“文革”蒙难记

• 何 蜀 •

任白戈（1906—1986），四川南充人，1925年参加共青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左联”执行委员、秘书长。1935年夏因国内政治形势恶劣而避居日本，团结在东京的中国左翼文化人，建立了左翼文化总同盟。1937年回国，七七事变后到延安。先后担任过抗大总校政治主任教员、抗大附属陆军中学校长、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十八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等。建国后先后任重庆军事接管委员会委员兼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西南文联和重庆市文联主席等，“文革”爆发时，他正担任着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重庆市市长，是重庆这个当时西南最大工业城市的“首席执行官”。

◇ 被一条注释打倒

“文革”开始以后，中共重庆市委和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即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们，虽然与全国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一样，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却并非“很不认真”，而是像领导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一样积极认真行动起来。任白戈亲自“挂帅”担任了重庆市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

一开始，重庆市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仿效北京的作法，掀起了揪“三家村”、打“黑帮”的高潮，由市委部署，首先批判了原《重庆日报》副刊《巴山漫话》杂文专栏，“揪出”了《重庆日报》以副刊部成员为主的“三家村”，并将1963年已受到批判处理的所谓“萧、李、廖（市委前组织部长萧泽宽、前副秘书长李止舟、前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廖伯康）反党集团”定为《重庆日报》“三家村”的“黑后台”，重新抛出来加以公开批判。同时，在《人民日报》6月2日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大学“陆平黑帮”、6月16日公开点名批判南京大学“匡亚明黑帮”之后，重庆市委也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批准，于6月21日将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定性为“黑帮”，责令其“停职检查”，并在22日《重庆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市委还派出200多人的强大工作组进驻重庆大学领导“抓郑思群黑帮”，将校、系两级领导干部90%以上“靠边站”，发动师生员工进行全面开花的揭发批判。

不料，当重庆市正在按照以往政治运动的经验开展这场运动时，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却挨了意外的一闷棍：7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不征求有关组织意见，也不向有关组织打招呼，突然袭击地采用在文章的注释里点名这种“史无前例”的手法，批判了重庆市的党政最高领导人任白戈。在这期《红旗》杂志上，以当时中央文革成员穆欣（不久穆欣本人也受到打击迫害）署名的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中，批判“周扬的一些追随者”“围剿鲁迅”，在说到“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竟然攻击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罪恶’”时，在注释中点明，这个“周扬的追随者”是任白戈。

在此前的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遭到严厉批判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为首的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随后，彭真遭到不点名的公开批判。任白戈是继彭真之后第二个被批判的大城市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不同的是，任白戈是在尚未被撤销职务并且其所在地区党组织及上级领导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遭到“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中央权威刊物公开点名的，而这时彭真虽已遭到批判但尚未在报刊上公开点名，同一期《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没有点彭真的名。

虽然这次任白戈被点名不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而且只是在一篇文章的注释里出现，但是当时在报刊上点名批判有严格的政策规定，决非可以任意而为。而且，当时作为中央舆论喉舌的传媒，都被视为传达的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因此，《红旗》杂志此举必然被视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部署，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那篇文章在各地党报转载（《重庆日报》于7月6日转载）、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后，重庆立即引起震动，许多干部纷纷打电话询问市委：被中央点名的任白戈是不是重庆的领导人任白戈。市委无法回答。

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后来在一次向群众所作的公开检查中回忆了当时西南局和四川省领导人处理任白戈问题的一些情况：“在穆欣同志的文章点了任白戈名的第二天，我和大章（注：李大章，时任四川省省长）、志高（注：廖志高，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商量如何处理的问题，先用电话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他当时答复是罢官。同时又用电话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答复，下午中央书记处要开会，等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再复。我们当时商量下决心一步走，（即罢官），由志高到重庆了解情况，等中央书记处会议答复后再宣布处理。晚上接陶铸电话说，邓小平意见，任白戈过去是周扬的追随者，这十几年来在重庆市工作还不错，要不要罢官还要看一看，你们写个报告来，中央再正式批（大意是这样）。我当晚即



按原电话转告了廖志高照办，不久就写了报告到中央，以后中央正式批复也是这样批的。”李井泉当时自我批判说：“这件事是我们直接执行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没有执行伯达同志指示的一个证明。”（李井泉《关于我在重庆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检查》，1967年2月8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宣传组1967年2月10日印）

7月8日，廖志高专程赶到重庆，召开市委会议，传达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的意见：任白戈的错误是30年代的问题，60年代的工作还是好的。随即，任白戈被迫以“请假检查”名义停止工作。

在重庆这样一个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党政一把手突然之间被以如此不正常的方式“打入另册”，威信扫地，在市民中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这是重庆局势陷入大动乱的一个重要起因。

经过多次政治运动“锻炼”的不少干部、群众，已经学会紧跟风向行事，“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就在任白戈被公开点名之后，马上就有人写了批判任白戈的文章、大字报或揭发批判材料寄给重庆市委及有关部门。比如，重庆大学电机系六个二年级学生就于七月九日写了批判任白戈1959年1月7日发表在《重庆日报》上的《创造出更新更美的作品》（给重庆市文艺干部和文艺活动积极分子的报告）寄给《重庆日报》。

#### ◇ “一个奇怪的华侨”

被安排“请假检查”的任白戈，对要求他承认的“鼓吹‘国防文学’”、“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攻击鲁迅”等罪名都不愿承认，怎么也想不通，无法写出让上级满意的检查。跟他一样想不通的省、市委领导只好从市委办公厅、宣传部和报社抽调了几位干部和“笔杆子”，同任白戈一起住进重庆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帮助他查阅资料，上纲上线“提高认识”，以便写出像样的检查“过关”。但用了近一个月时间，他的认识仍然未能“提高”，他始终认为，自己当年在日本得知国内文艺界发生“两个口号”之争后，写文章宣传“国防文学”，是因为那是党提出的口号，他那时年轻，在日本看不到毛主席的书，不知道党内有毛主席这条路线。那时周扬是代表党的，是领导人，而鲁迅是党外的，听周扬的，在组织上没有错。他还坚决否认自己有“攻击鲁迅”的错误，认为自己对鲁迅从来就很尊重、崇敬，鲁迅逝世时，自己在东京组织了追悼会，还写了诗进行悼念……他的认识无法“提高”，最后只好由“笔杆子”们按照当时报纸批判的调子帮他拼凑了一个检查上报中央。

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全面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成为全党共识和中共中央正式决定。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显然已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明白任白戈的下台命运已无可挽回，大约是为了下一步处理方便，遂通知将任白戈转移到成都，安排住进了锦江宾馆。实际上这时任白戈已等于是被软禁起来听候发落。

然而形势骤变，8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东方红礼堂（即锦江礼堂）召开驻四川大学工作组的检讨大会，一些首都赴蓉红卫兵及川大学生认为这是“假检讨”，冲击大会造反，进而与省委形成对立，千余人在省委大门口静坐绝食……省委不愿让任白戈被造反派学生发现抓走，便又将他于8月28日深夜转移，给他改换姓名，以“某省厅长”身份住到成都近郊一处招待所。

8月31日深夜，省委又派专车，将任白戈化名“省农业厅视察室主任张新”，转移到简阳县偏僻山沟——三合坝。并对负责保护（也可说是监视）的公安人员交待，如有农民问起，就说“张主任”是归国华侨。

后来，有造反派文章写到任白戈的这一段经历，用了“一个奇怪的华侨”这样的标题。许多人都还记得，“文革”前的50年代，曾有一个隐藏于乡间的国民党特务杨进兴被抓到了，报上报道这件事的文章就以“一个奇怪的贫农”为标题，一时间很吸引了不少读者。深受革命教育的青少年们对“一个奇怪的……”这样的标题自然是耳熟能详，运用自如。可叹的是，昔日的革命领导人任白戈，如今竟也落到了与革命的敌人国民党特务一样以“奇怪的……”为伪装东躲西藏的地步。

就在这期间，8月27日，中共重庆市委为争取主动，召开大专院校革命师生代表会议，号召革命左派“集中火力炮轰市委”。李井泉到会讲话，不得不宣布将任白戈罢官。任白戈成了在职的领导人们力图用来吸引群众批判火力的靶子。

#### ◇ 住宅成了“展览馆”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文化大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毛泽东在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概念的时候，并未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怎样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作出明确的界定，因此，无论中央领导人还是普通百姓，谁都说不清楚怎样才算是“走资派”，在长期受到的左倾思想教育影响下，一般人就把那些经济上或生活作风上有点毛病的干部，或政治高调唱得少一点，生产抓得多一点，对群众的生活福利关心多一点，对城乡集市贸易搞得活一点，对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表现得开明一点……的领导干部，统统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任白戈既已被西南局和省委宣布正式罢官，那就等于成了可以千人批万人斗的对象。群众对领导干部的不满情绪有了一个合法渲泄口。但群众很难了解任白戈有些什么政治上或工作上的问题，更容易引起兴趣的是其生活上与市民有什么不同。这时，位于重庆市委大门对面的第六中学的学生（该校学生中干部子弟较多），在首都南下红卫兵的鼓动下，率先翻墙闯入市委大院，到任白戈住宅“造反”，并将其作为任白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对外展出。

以往在市民心目中十分神秘的市长住宅变成了公开的“展览馆”，自然轰动一时，当时传单、大字报上对任白戈住宅的称呼是“六十年代的地主庄园”。红卫兵给任白戈住宅取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在“文革”前大搞阶级教育期间，四川搞了个有名的刘文彩“地主庄园”展览，一时间报刊发表文章，舞台演出节目，纪录电影全国组织观看，“罪恶的地主庄园”家喻户晓，青少年们记忆犹新，就如法炮制，套用了这个提法。其实任白戈住宅并不是什么“庄园”，只是市委院内一幢旧式小楼及其附属建筑。只因为他是重庆市的“一把手”，按照当时已经形成的体制等级和“工作需要”，住得比一般干部宽一些，显得特殊一些。

因为在“文革”之前已经深入进行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深入进行了“反修防修”教育（特别是批判了苏联有一个“修正主义特权阶层”），“四清”运动中又反复强调了领导干部的“懒、馋、占、贪、变”的蜕化变质“规律”，“文革”前夕还大量宣传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廉洁简朴的生活作风，所以，人们对干部生活上的任何一点特殊化都十分敏感。这时去“参观”了任白戈住宅的群众，看到他一家人能拥有楼上楼下那么多房间，大多会感到震惊，产生愤慨之情。必然将此住宅看作是“修了”（“堕落为修正主义了”的简略说法）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标志。一些当年去“参观”过的人士至今记忆犹新的，除去房间多以外，还有这样几点，一是房间里的灯多（当年城市居民通常一家人只有一盏灯）；一是那些房间中有专门的“钢琴室”——而这是当时许多“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几代人同住一间房）的平民不敢想象的；还有就是住宅中有好几个厕所——而在当年，城市居民往往一个大杂院甚至一条街才有一个公共厕所；以及书柜中摆放着不少属于“封、资、修”禁书的文学名著……于是，有参观者出来一传，

加上传单、大字报一炒作，自然就引起观者如潮了。

不过，这个“展览”并没有热多长时间，群众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在任白戈之后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现任领导干部身上去了。任白戈毕竟下台早，缺少这方面的“现行”。

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都作了检查，各级领导干部被迫“转弯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为大势所趋。李井泉开完会回到成都，立即与省委和重庆市委研究，决定把任白戈送回重庆（大约是准备随时交给群众批判了），随后，主持重庆工作的重庆市委代理第一书记鲁大东把任白戈接回重庆。回来后，任白戈被安排住在市人委旁边的农场管理局招待所。直到群众造反运动兴起后，市委领导瘫痪，任白戈才落到了造反派组织手中。

#### ◇ 揪来斗去的“死老虎”

1967年1月，全国到处掀起了“一月夺权”风暴，《人民日报》1月22日社论欢呼：“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重庆造反派和奉命“支左”的驻军部队也在这“伟大号召下”行动起来，于1月下旬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

1月29日上午，阴云密布，寒气袭人，重庆造反派群众和解放军驻渝部队指战员30多万人在市体育场举行“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宣布造反派已在解放军支持下夺取了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并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孙先余、廖苏华及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等揪到会场批斗示众。次日重庆《新闻报道》（《重庆日报》因被造反派夺权，从1967年元旦起停刊，改出《新闻报道》）发表了题为《山城革命造反派掌权黑市委完蛋》的报道及大会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是任白戈被戴上一米多长的纸糊高帽子，由红卫兵反扭双手作“喷气式”状示众，照片的说明文字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白戈的一副狼狈像”。不过，天公不作美，会议进行中下起了小雨，批斗者与被批斗者都被雨淋成了“一副狼狈像”。

“一月夺权”引起了造反派的大分裂，重庆市的造反派组织分成了两大派，以重庆大学八一五为首的一派，在驻军支持下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革联会，另一派则称革联会是“假夺权”，重大八一五是被“黑市委”收买了的“叛徒”。他们在互相攻击的时候，都竞相比赛谁对以任白戈为首的“黑市委”更仇恨，都认定对方与任白戈为首的“黑市委”有勾结。

在1月29日的誓师大会之后，任白戈作为一个“活靶子”被一些群众组织揪来揪去批斗，不知什么时候被弄到了工人造反军总部。而工人造反军很快成为反革联会一派的主力，与八一五派矛盾冲突加剧。2月23日晚上，八一五派组织人马抄砸了设于市总工会的工人造反军总部，当他们查抄到一个没开灯的小房间时，找到了被关在那里的任白戈，当时任白戈头上戴了个大草帽，脸上被一个大口罩遮住。于是，又有谣言传出，说任白戈被工人造反军总部“化装隐藏”，造反军总部头头与任白戈有见不得人的交易……

任白戈落到革联会一派群众组织手中后，1967年3月31日，这一派的重庆市委、市人委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在人民大礼堂召开了批斗任白戈的大会。除去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发言批判外，原市委书记处的一个书记，原市监委的一个副书记，原任白戈的一个秘书，都被迫上台按照当时的“主旋律”口径作了“揭发批判”发言，以表明自己愿意“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任白戈被关押在革联会期间，行动还比较自由，每天自己到市委机关食堂吃饭。云南作家周孜仁当年作为重大学生曾被调到革联会编辑《山城战报》，他的长篇回忆录《红卫兵小报和我》

对在市委机关食堂吃饭的任白戈有一段记叙：

“他和我们在同一个机关食堂搭伙，凭票吃饭。食堂大，至少有二三十张桌子，条凳多已损毁，后来者打好饭菜往往只能站着吃。任白戈任何时候都是站着吃饭的，而且听炊事员说，领导早有交代，任是走资派，只能卖给他低价位的菜。我曾有意识靠近他的饭桌吃饭，有时干脆就把菜端过去和他放同一张桌子站着吃。他的碗里果然每次都是些清水菜肴。不过他吃得极认真，满嘴咂咂有声。我猜想他的心态绝对正常，因此虽陷逆境而身体依旧十分硕壮，只是胡须常不剃刮，如秋草之零乱，便显出了许多落魄来，很像造反派漫画上的形象。”

当时造反派的漫画上，通常把任白戈画作一只人面虎身的趴着的老虎，既寓示其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表明其已是一只被打倒的“死老虎”。

#### ◇ “红五条”作出政治定性

因为掌权的一派要“捍卫一月革命伟大成果”，而对攻击革联会的另一派进行了镇压，另一派则上北京告状，控诉革联会在搞“资本主义复辟”。中共中央不得不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5月16日，毛泽东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时称“红五条”），在五条意见的第一条中即提出：“重庆市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等人的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这样，任白戈被中共中央正式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公开宣布撤销了职务。从此，以任白戈为首的前重庆市委领导班子，有了一个钦定的新名字：“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

任白戈在听到传达这个“红五条”之后有什么想法？没有见到他事后的回忆。不过，另一位领导干部的回忆可资参照。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武光，在《不是梦——对“文革”年代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一书中写下了他在听到中央通过“两报一刊”社论将他点名定性为“中国赫鲁晓夫在新疆的代理人”时的绝望心情，“第一次听到广播那天，我正在厕所洗衣服……我怎能经受得住这样晴天霹雳式的致命的打击呢？当时，我只觉得一阵昏眩，差一点跌倒在地，我挣扎着扶住墙，才慢慢地走回囚室，然后一头栽倒在床上。”他称这一天是“一个足以让人绝望的日子”。武光的这段回忆，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体会任白戈在那时的心情吧？

#### ◇ 在武斗中历险

“红五条”的公布并未使重庆的局势得到稳定，反而陷入了更大的混乱。

1967年6月，重庆造反派的两大派已经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开始以棍棒、石头进行武斗。6月5日至8日，在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发生了武斗，两大派纷纷前往增援，形成大规模武斗。就在这期间的6月7日，八一五派江北区“捍卫红色政权指挥部”为显示自己“掌握斗争大方向”，在江北城街道办事处门前召开了批斗任白戈的大会。

任白戈是从重庆大学押来的，批斗完后，下午3点多钟，八一五派将任白戈用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装上，准备送回重大。开车后不久，看到路边有一个自来水站（当时自来水还没有接入

每户人家，居民都得从水站买水后挑回家中使用），任白戈提出想喝点水，押送的造反派也想喝水，便停下车到水站取水，不料，正在此时，江北十六中学的反到底派红卫兵突然冲来，将任白戈抢夺到自己手中，呼啸而去。

十六中的反到底派将任白戈抢到手后，迅速将其转移到三钢厂。三钢厂的反到底派又将其转移出去，辗转经江北县、北碚区、巴县青木关等地，绕了一个大圈子，然后秘密送到市中区观音岩下方的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以后，又转移到了重庆医学院。当时重庆医学院是反到底派势力较强的据点，不仅在该校占大多数的反到底派重医兵团控制了学校局势，而且重庆大专院校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和国防工业系统的反到底派组织军工井冈山总部成立以后，也都设在那里。

然而，重庆医学院很快便成为两大派武斗的一个焦点。

6月23日，八一五派武斗指挥部决定拔除反到底派设于重庆医学院附属小学内的武斗据点，两派上午在重医附小展开武斗，小学被纵火烧毁，武斗中死4人，伤百余人，财产损失3万余元。

7月1日，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武斗，使用钢钎、刺刀、自制燃烧瓶等，死2人，伤数十人，附一院门诊部全天停诊。重庆医学院66级毕业生、反到底派《东方欲晓》报主编于可被钢钎刺死……

在这样的形势下，反到底派不得不考虑任白戈在这里的安全问题。一天，反到底派重医兵团的一个负责人去查看任白戈住处情况，看到他房间的窗台上放了几个干馒头，有些奇怪，问他怎么剩些馒头不吃？任白戈回答，因为担心他们一旦武斗起来顾不上给他送饭，自己早作准备，省下来作备用粮。

重医兵团发现继续关押任白戈已经是个大麻烦，便找了附近的驻军部队，提出要把任白戈交给他们管理。部队指挥员一听，马上回绝。为什么？因为“文革”初期中央就有指示，部队不能作“走资派”的“防空洞”，有的部队就是因为“文革”初期收留了去躲避群众批斗的领导干部，而遭到了群众组织的冲击，有的还受到了中央的批评。加上反到底派与重庆的支左部队素有矛盾，部队指挥员不得不防反到底派的这一提议是否“别有用心”。

重医兵团负责人无计可施。一天，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一位负责人来到重医，重医兵团负责人向他说起任白戈不好安置一事，那位军工井冈山负责人开玩笑说：“那有啥子难的？随便找两个人把他拉出去枪毙了算了。”

好在任白戈没有听到这几句对话，否则他一定会好几天睡不安稳觉。

玩笑归玩笑，问题还得想法解决。最后还是由军工井冈山总部派出江陵机器厂的一个职工，在重庆城里找了间僻静处的房子，把任白戈转移到那里去住下，并由那个职工专门对他进行“监护”。

从7月底到8月底，整个山城炮火连天，两大派深陷于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狂潮之中，没有谁再顾得上去斗“走资派”。任白戈也就乐得当了几天被“监护”的“逍遥派”。

没有抓到“走资派”时，觉得缺少了批判的“靶子”。“走资派”在手里交不出去，又成了烫手的炭圆。反到底派从抢到任白戈并将他“隐藏”起来，到急于想把他交出去而不得，是一

个戏剧性的变化。

终于，不知是哪个高人想出了办法，反到底派组织了一次批斗会，请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市革筹）派人参加。市革筹派来的是重庆军分区的干部。任白戈被押到会上批斗一番之后，反到底派就一本正经地当众把他交给了军分区来的代表。

从此，任白戈就由官方“监护”起来，1968年6月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其中将任白戈与其他几位被打倒的领导干部一起并称“中国赫鲁晓夫……在西南及四川地区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黄新廷之流”，进一步明确了对任白戈的政治定性。

这时，这位“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理人”已经被送到北京关押，交到了冷酷无情的中央专案组手里……直到以后得到“解放”。

~~~~~

【往事如烟】

太阳熄灭了一半

• 陈向阳 •

1971年的9月份，厂里让我去参加十一天安门广场的“打旗”任务。在中学时我参加过1968，1969，1970三年的广场组字。在组字的人群边上还有一圈人打着红旗，给那些字镶个边。这回我从组字变镶边了。全造纸厂去了16个人。打旗到底比组字容易，工人也比学生听话，所以不用狠练。9月8号才通知，一个星期里也只练了2次。刚说要去天安门广场实地合练呢，9月16日却让我们去福绥境街道听传达中央指示。什么指示呢，说今年十一天安门游行取消了，晚上也不放花了。这可太奇怪了！心眼多的人马上就能猜出是出了大事。年年十一都游行，今年本来也要游，突然又不游了，不是半道出事是什么？中央指示说“主要因为战备”。怕苏修趁着十一突然进攻？可1969年珍宝岛刚打完，最紧张的时候十一游行也没耽误啊。肯定是出事了，中央出事了，而且是大事。

十一那天挺平静，天安门什么活动都没有。只在各个公园里演节目。我们厂去了20人，在紫竹院公园里坐在指定的地方看节目，不让到处乱逛。公园也不是谁想去就去，凭事先发的票进门。

十一过后，一股神秘气氛开始弥漫，先从军队大院传出“小道消息”，说军队早已进入一级战备。战备倒不新鲜，一直都在战备。但这回不一样了，不像是防备苏修。防备苏修不会让咱们自己的陆军把自己的空军缴了械吧，传说陆军已经接管了空军机场，一架飞机都不许起飞，因为有人要搞政变！终于我们院里也开始有人眼睛发亮，脸上略带一丝轻蔑，说话吞吞吐吐神神鬼鬼，不时一声冷笑。这是掌握了重大机密却又不能说而憋出来的症状。在10月中旬的一天，一个哥们儿实在憋不下去了。一人独享重大机密决非幸福而是折磨，化折磨为幸福的办法就是向哥们儿泄密，但先要对方发誓到此为止决不外传。他在我的手心描出一个“林”字，这就是政变的头子了，他让我拼命往高了猜。林，林，林什么呢？林伯渠？不对，这个林好像已经死了，还有林什么呢？，林，林，林武汉，更不对，那是我小学同学，必须是中央的大头目，还掌握军权的。林，林，啊！我突然遭了电击一样，眼睛猛的瞪起来，倒吸一口凉气：能是他？！接着嘴也出毛病了，“林一，林一，林一……”另一个字已经到了嘴边，却怎么都说不出来。那哥们儿看我恐怖的样子，料我猜对了，使劲点头：“对，就是他，就是他！”我感到全世界在颤

抖，周围的一切都变了，但嘴里只能说：“我（重音，读第四声）操！我操！！我操！！！”语言实在不够使，根本表达不出那种震撼。

本来的世界多么简单明亮：毛主席光芒万丈，世界第一，林副统帅光芒不到万丈也有九千丈。有了正副统帅一切都不用担心了，全中国全世界都安排好了。可突然间，天上的太阳熄灭了一半。这跟揪出刘少奇可不一样，毛主席和刘少奇斗争的消息早就不断泄露，至少给了我们半年的“预警期”，而且那会儿的刘少奇，说句不敬的话，连那会儿的毛主席也算上，还没上升到如今正副统帅如同太阳一般的高度。本来党的九大已经是胜利大圆满了，刘少奇一伙子全清除了，原来颠倒的全都摆正了，从此乾坤朗朗日月有序。可突然，这一切全垮了，全是假的了！这可怎么办呢？如果林副统帅都能变成坏蛋，那除了毛主席一个人，还有谁靠得住呢？如果这样的事都能发生，还有什么事不能发生？如果这样的事都可以相信，还有什么事不能相信？如果什么事都能信，也就是什么都不能信了。

◇ 思想转弯

咱们毛主席党中央怕冷不防把人民吓坏了。就像一个人的亲妈死了，你不能马上告诉他死了，得先从有病，病重，一点点来。于是先发下通知说四个伟大不能说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还让每个人把毛主席语录拿出来（那会儿是人手一册，上班下班全带着），把再版前言撕掉。虽然没有任何解释但已经透出了病重的消息。四个伟大和再版前言可都是咱林副统帅的杰作。

终于，在10月底中央文件传达到了我们这个北京的社会底层，全场鸦雀无声，连光惦记家里一天三顿饭的老娘们也知道这事不小。那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更是听的两眼放光。他们也有点担心，怕把高兴劲暴露出来招惹麻烦，但心里肯定是乐坏了，正在美滋滋的看咱们共产党毛主席的笑话。他们一般都挺聪明，掂的出来这个笑话有多大。

传达的文件除了中央通知还有罪证，主要是“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是个政变计划。此外还有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刘书记念了两遍大伙也没听明白什么意思，学问太大。刘书记说不忙，以后还要使劲学呢。本来我们普通群众是每星期一、三、五下班后半小时政治学习，经常是15分钟念段报纸就“放学”。这回文件传达后，变成了每天下班学一小时，星期四下午还占上班时间学半天。学习太必要了，这是给广大革命群众定心安神，以防头晕脑乱，动摇了对咱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仰。

刘书记，鲁副书记，还有几个党支部委员参加各个班组的学习，严密监督以防“逃学”。每个人都必须发言，这是态度问题。大家发言里都有“抢班夺权，阴谋政变，暗杀毛主席，罪该万死”之类的。记性再好点的就能说出“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文件报纸听了一遍又一遍，连大字不认几个的半大老太太也能说出“仓惶出逃，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一类的词。可刘书记不喜欢千篇一律，启发大家要批的深刻点，最好用自己的话批。但一离开报纸上的句子，大伙的话就说不利落，容易磕巴。还是新入党的古大翠带头，她虽然人比较糙，但对毛主席共产党是绝对的赤胆忠心。她说：“这林秃子早就是个坏蛋，嘴上说好听的，背地里一贯反对毛主席，他根本就不会打仗，净抢别人的功劳”。不会打仗文件上到有，但抢别人的功劳好像文件上没提，还算有点新意。古大翠接着来：“我早就看出他林秃子不是个好东西！”大伙精神一振，想听听咱们大翠眼力怎么这么好，“你看他那眉毛长的。那秃瓢脑袋。那小白脸。拿本语录装模作样，一晃一晃的。还有讲话那声，像个爷们儿吗？一看就不是好人！整个就是奸臣！”古大翠说的有道理，好几个半大老太太赶紧点头表示早有同感。但爱说怪话的小于子小声的来了一句：“那你怎么不早说呢？”大伙有点想乐：早说？要早说了，今天的古大翠可就不知道是死是活了。刘书记赶紧把批判的焦点往正道上引，说咱们要批林彪的反动本性，

不能光看表面。于是大伙又回到报纸文件的套路。“五七一工程”比较好批，因为都是大白话，就是搞政变搞暗杀呗。谁敢暗杀毛主席当然是罪大恶极，万恶不赦，死有余辜，……反正什么词狠就使什么词。肚子里新词比较少的文盲半大老太太爱用“杀千刀的”之类的老词。

在批判中出现了一个“绞肉机”疑问。五七一工程攻击咱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绞肉机”，今天拉这派打那派，明天拉那派打这派，把有功之臣一拨一拨的都绞了。古大翠说对付坏蛋，比如林秃子反革命集团，就是不能客气，就是要绞，绞个稀巴烂，有一个绞一个，有一对绞一双，有一群绞一群！大伙虽然觉的古大翠显的太狠了点，不像个妇道人家，但话说的没大毛病。不想刘书记却不认可，皱着眉不断摇头：“大翠呀，这么说可就上了他们的当啦，他们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绞肉机，纯粹是歪曲诽谤，是给他们政变找借口呢。咱们可不能认下来呀，顺着他们说就不上当了吗？”大伙一听，刘书记是比古大翠强，可人家古大翠哪错了呢？坏蛋是不是该绞呢？于是都竖起耳朵听刘书记怎么说。可刘书记讲了一大阵，绕了一大圈，就是没直截了当的说：坏蛋到底是该绞呢还是不该绞，给大伙和古大翠心里留了个大问号。

但真正的学习难点还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也不知念了多少遍，大伙还是不懂。刘书记特有耐性，一点点来，先把不好懂的地方一个个的解释，比如“魏陈二同志”是谁，“西方一个山洞”在哪，“我的朋友”又是谁，“白云黄鹤的地方”又在哪，还有什么“晋朝人阮籍”，“皎皎者易污”，“水击三千里”之类的。学了一天又一天，除了几个全文盲老太太不可救药，其他人差不多每个词都明白了。可全合在一块还是不懂，也不是不懂，是有点糊涂：咱毛主席过去不这么说话呀。比方说：“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过去咱们可都说“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怎么突然已经让人打的粉碎了？这话也就是毛主席能说，换我们老百姓谁说谁就是反革命呀！他老人家怎么有点底气不足呢？大不敬的说吧，简直是悲观丧气。好像咱毛主席不赞成林彪，可不赞成您倒是说话啊，他林彪不得乖乖听您的呀，怎么就身不由己让人家当大旗用了呢？你听：“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我就只好上梁山了。……。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吹的越高，跌的越重，我是准备跌的粉碎的。……”听听！咱毛主席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呢？

念了一遍又一遍，大伙终于明白这封信的意思是说早在1966年，五年前呢，咱毛主席就看出林彪有点不地道，嘴上说一套，实际不知想干什么，所以暂且先由着他，看他小子玩什么花招。我们维修组另一位党员梁秀英赶紧公布体会：“咱毛主席早就看出林彪的阴谋诡计了！”但马上又楞了，因为接着就得解释：看出来为什么不收拾他呢？古大翠赶紧解围：“咱毛主席那是考验他呢！”考验？有这么考验的吗？给他个副统帅、接班人？大伙的眉头还是没解开。刘书记又接着说，说了半天也没说圆。既然学了好些天还说不圆，大伙心里不知不觉就用了自己的解释：敢情咱毛主席让人家给涮了，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啊。虽说林彪最后折戟沉沙了，算是老天有眼，可咱毛主席当初确实是看走了眼，上了林彪的当。说句大不敬的话吧，换上咱古大翠都不至于上当，古大翠准保重用朱德陈毅那样的，一看就是忠臣。就凭林彪那模样？没戏！

林彪爆炸以后，老百姓嘴上不说，可在心里边呢，毛主席再不是光芒万丈了，党中央也不伟大正确了，干脆没法相信了，里边随时随地不定有什么大脓包大炸弹呢，只不过包着裹着不让咱老百姓知道。可说不定哪天就包不住了，就能吓人一跳。不过呢，有了林彪这出戏垫底儿，再有什么也吓不住咱老百姓了。

□ 寄自澳大利亚

~~~~~

【前事不忘】



## 无处忏悔

• 陈焕仁 •

自“文革”结束以来，就有不少有识之士，主张对“文革”进行实事求是的总结和认真的反思。人们特别希望“文革”中的“造反派”，“整过人的”，当过“红卫兵”的，“亮私不怕丑”，大胆地站出来，对当年的所作所为有个说法。巴金就一再主张建立“文革”博物馆。季羨林老师在他的《牛棚杂忆》自序中，就急切地谈到，他一直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他一直期待着“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的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拿来与被折磨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对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的。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民族立了大功，只会得到褒扬，不会受到谴责的，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刘心武先生最近也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文章：《难以忏悔》。他在文章中说：“应该站出来忏悔的，是在‘浩劫’中参与了‘劫’的那些人。”心武先生希望“真正处于主潮中的‘红卫兵’，如实地写出当时怎么‘破四旧’毁坏文物、怎么抄别人的家、怎么抢铜扣的皮带打人至残至死、怎么在大字报上以语言暴力伤害人的心灵、怎么反人道反人情的？”刘心武先生说：“我们期待着。这不是追究责任。这是一种神圣的期待。”

我和季羨林老师和刘心武先生，在“文革”中完全不是同一类人。我虽然远够不上季羨林老师和刘心武先生“期待”的那类人的“标准”，但不仅在“文革”中没有当过“牛鬼蛇神”和关过“牛棚”，还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文革”红旗——新北大的一个“红卫兵”，是毛主席多次接见的北京“五大造反派领袖”聂元梓那一派的“造反派”。我不仅作为“革命中将”参加了北大的“文革”运动，还与众多的“天兵天将”南下串联，煽风点火。扛着红旗背着背包步行串联，从韶山走到井冈山，再从井冈山走到南昌。参加了学校两派冤冤不解的派仗。在两派大规模武斗中，披戴盔甲上过“前线”。毛主席支持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领北大，又“斗私批修”接受工人和解放军的再教育。林彪发布战备动员令，又背着背包战备疏散到北京远郊区的深山，进行改开换地拦沟造地“教育革命”。毕业分配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改造，现在是一个满头白发的文化人。

我对号入座，按照“文革”表现，自觉地把自已划归季羨林老师和刘心武先生“期待”的那类。但我可以对天发誓，对于“文革”中的那些不光彩的表现，我丝毫也没有“日本鬼子似的不愿检讨和忏悔”。自接受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再教育”，特别是“文革”中亲眼目睹的严重事实，我一直深藏着一个心愿，有一天一定要自己亲历的“文革”赤条条地写出来，作为“文革”病毒的免疫疫苗，注射给那些有权决定人民、民族和别人命运的人，让“文革”整过人和挨过整的人从中得到启示和教益，让中华民族以后再也不用重演“文革”惨剧。

我个人认为，对“文革”进行总结和反思，决不是文学圈内之事，它完全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任务。眼见着“文革”渐渐地离我们远去，眼见着决定和主导“文革”的人们不是作古就是垂垂老矣，眼见着参与“文革”的主潮人物现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眼见着“文革”中受折磨和遭迫害的人一个个地离开这个世界，而上一个百年又才刚刚同我们告别，我常常有“一万年太，只争朝夕”的急迫感。中华民族有义务对“文革”平心静气地总结，就如下问题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有个交代：在上一个百年的六七十年代，在中华大地上，为什么突然发生如此重大的劫难？它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思考？它是否暴露出了我们民族的某些劣根性？对我们认识

当前的改革和今后的社会发展会有什么借鉴？等等，等等。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全民族就会痛失最好的反思机会，就会永远愧对人类世界，永远愧对我们的子孙！

我与季羨林老师和刘心武先生有同感，过去写“文革”的作品，多是“文革”中遭受折磨和打击的人。那些作品不免存在太注重个人恩怨和当事人的责任。“文革”之中各种人的处境不同，那些作品也不免存在某些片面性。季羨林老师和刘心武先生因而主张，“文革”中的“主力”“先锋”和“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红卫兵小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革命造反派”，也应该从自己的角度，从自己的经历和思想，也对“文革”来一个“秉笔直书”，从另一个角度和方面，说说当时被折磨和被批斗的人不可能知道和想象不到的情况。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中国所有的政治运动，没有一个运动可以与“文革”媲美。那是一个多么复杂多变的运动，它牵涉的面多宽，触及了多少领域，它的复杂性完全是“史无前例”和“空前绝后”！个人功过是非事小，从中找到杜绝“文革”灾难不再在中华大地重演，却是民族大义。

何止“文革”应该好好地总结和认真忏悔？只要站在世纪之交的山口，回目中华民族上个世纪的心路历程，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确有不少值得总结和忏悔的事情！仅从我们党内来说，当年在中央苏区，只要怀疑谁是 AB 团，拉到山上枪毙了就是了。延安整风运动中“搬石头”，说谁是奸细和阶级敌人，就立刻将谁关起来当成“石头”。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哪怕是对党支部书记有意见，就会视为反党，就会被打成右派分子，年纪轻轻就送到乡下劳改，全国右派打了几十万。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彭德怀不过给中央主席写了一封信，说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真话，结果连同赞成他的观点的人，一道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全国的四清运动，不知道又整了多少不应该整的基层干部？我以为“文革”浩劫，不过是党的历次政治运动发展的必然，是集历次政治运动“左”之大成，是中国长期封建专制和“极左”病毒的集中发作，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部非常宝贵的反面教材。

我们把视线从党内再移向全民族，我们就不难发现，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中华民族经历多少苦难？造成这些苦难的原因，固然有外族入侵，但更多的是中华民族的内乱，民族内乱往往引来外族入侵。如果我们民族的封建专制没有数千年，如果我们是一个具有民主传统的民族，是一个不惧怕强权尊重真理的民族，是一个不讳疾忌医注重反思和真正懂得前车之鉴的民族，是一个为了真理和人的尊严敢于牺牲生命的民族，我们也许可以避免许许多多的内乱，避免外族的不少入侵，我们的民族肯定会比现在更加发达、繁荣和富强。

基于“文革”给我的认识和思考，我一直注意研究“文革”。我曾经将“文革”中的日记整理出长达数十万字的《红卫兵日记》，真实坦承“文革”中，自己在学校、工厂、部队和农村的所见所闻，经历的重大事件，自己和伙伴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思所动，在“文革”中的种种表演，各色人等在“文革”中的遭遇和命运，对“文革问题”作了老老实实的坦白和忏悔。我的作法与季羨林老师和刘心武先生的“期待”不谋而合，也算实现了他们的一个期待。

我的书稿完成后，结果却是无处忏悔！不知道什么原因和出自什么耽心，多少年来，对写“文革”的作品严格限制出版。不仅出版社，包括报刊和音像制品，凡涉及“文革”的作品，选题必须层层报批。像季羨林老师和韦君宜这样有影响的名人，作品经过审查尚能出版。像我等这类小物，即使你想公开正式向读者忏悔，身份上却上不了那个档次，够不上那个规格，连选题批准都很难。我所认识的“文革”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后来不少人都受到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同样对待，其中不乏悲剧式的人物。一场劫难之后大彻大悟，不少人都在默默地反省、检讨和忏悔，他们却无处忏悔。

□ 作者通讯地址：成都市百花东路 2 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邮编 6 1 0 0 7 2  
~~~~~

【书刊评论】

不应有的“整理”——读陈焕仁《红卫兵日记》有感

• 何 蜀 •

在2005年从四川省社科院编的《当代史资料》上读到选载的陈焕仁先生《红卫兵日记》时，就很感兴趣，希望能早日读到全书。2006年2月，广州的朋友用快件送来了香港中文大学刚出版不久的此书，我马上翻看了一些章节。在官方竭力控制、淡化对那段历史的描述和反思，在许多当事人还不愿或不敢正视那段历史，不愿或不敢言及那段历史的情况下，作为当年“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陈焕仁先生能向社会提供这样一部日记，确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说实话，在读《当代史资料》上选载的片断时，我就感到其中有些地方叙事太有头有尾，对话太多，不大像是当时的日记，而更像现在重新加写和改写的。读到正式出版的书中一些内容时，更感到这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了。

这里举书中两处例子来说明。

一处是日记中记载陈先生一行到重庆大学串连的情况。问题主要出在9月14、15日这两天的日记里。日记中记载：陈先生一行去找重庆大学“8·15兵团”串连，重大“8·15兵团”的学生向他们介绍：“听说中央文革领导北大师生赶走了工作组，他们也在8月15日赶走了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建立了8·15兵团。现在8·15兵团已经夺了重庆大学的党政财文大权，成为重庆市造反精神最强的队伍，连重庆兵工厂那些保皇派组织，现在也不敢跟他们公开作对。”（122页）第二天，陈先生一行提出要到其他几所大学串连，“他们告诉我们，重庆其他大学的学生早跑光了，他们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9月5日发了通知，要求全国各地组织革命师生到北京，参观北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重庆各高校接到这个通知，除了重大8·15兵团留校同走资派斗争，其他大学的学生全都北上了。”（123页）

在这短短的两则日记中，就包含着不少史实上的错误。

当年重庆大学的造反派学生组织叫什么名字？了解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叫“八一五战斗团”（或写作“8·15战斗团”），是“战斗团”而非“兵团”。作为当时到重庆大学去串连的陈先生，走进重大校园内就会看见周围的标语、大字报上瞩目皆是“战斗团”的落款署名，而且听重大学生介绍情况时也会满耳皆是“八一五战斗团”，如果是在当时记下的日记，显然很难把“战斗团”错记为“兵团”（正像任何一个外地学生到北京大学串连后都不会把“新北大公社”错记为“新北大兵团”一样）。这样的错，一般来说，多半就出在不是当时所记而是事隔多年后的添加。

除去重大学生组织名称的错误外，日记中所记重大学生介绍的情况也不像是当时所谈，错误颇多。

重庆大学赶走工作组，是在8月15日吗？否。

8月2日，被重庆市委打成“黑帮”的重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在市委工作组监禁迫害下愤然自杀，引起重大师生震惊、愤怒。8月3日，中共重庆市委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学文革积极分子大会，正式传达北京新市委召开的大、中学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精神和毛泽东有关撤销工作组的指示、刘少奇关于“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等讲话。大会未完，重大学生就已闻讯在校内写出大标语：“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赶走工作组，自己闹革

命！”当晚，周孜仁、吴庆举等学生写出《就郑思群自杀事件给西南局、李政委的一封信》，要求重新审查郑思群死亡事件，随即引来众多质问工作组的大字报。8月5日，焦头烂额的市委工作组奉命撤离重庆大学，遭到部分师生员工自发拦阻，要求澄清郑校长死亡事件并作出检查。工作组被迫暂留学校，直到《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正式公布的当天下午，工作组才“悄然遁走，撤了个精光”（见周孜仁《郑思群之死和重庆的8·15运动》，原发表于新语丝网）。

也就是说，驻重庆大学的市委工作组是在8月8日下午就撤走了（或者说被学生赶走了）。那么，8月15日这天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这天是因重庆师范专科学校（今重庆师范大学）处于弱势的反工作组的学生来找重大学生支援，重大学生大队人马去到师专，与保工作组一派发生争执，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被迫前来解决问题，被造反学生们纠缠至深夜。此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八一五事件”，并被重庆造反派认为这是他们向市委造反打响的“第一枪”，而拥护市委的干部、群众则坚信这一事件与“匈牙利事件”无异，认定“八一五遭得很”，于是，围绕“八一五遭得很”还是“好得很”，重庆全市民众展开了一场大辩论。此后重庆的造反派一度自称为“八一五派”。

简单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就会明白，陈先生日记中所记的那位重大学生“介绍”的情况，显然不合于史实。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这些内容都是不了解情况的陈先生事后添加的。

至于陈先生日记中所记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9月5日发了通知，要求全国各地组织革命师生到北京，参观北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重庆各高校接到这个通知，除了重大8·15兵团留校同走资派斗争，其他大学的学生全都北上了……”也不对。这显然又是不了解当时史实的陈先生在想当然地编写。

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于8月26日成立之后，马上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八二八”事件。即8月28日，八一五战斗团一些学生到江北区“宣传十六条”，在江北老城区江北城与当地一些干部、群众发生争执，引起冲突，被江北区和市里的党政领导当作打击造反派的由头，授意和组织一些干部、群众炮制出控诉“八一五暴徒”制造“八二八惨案”的传单，用上等好纸大量印发，展开了大规模的声讨、批斗重大八一五学生及其同情者的狂潮。但因中央支持造反派的态度日益明确，重庆市委不得不改变态度，于9月3日晚上在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召开十二所大专院校代表会议，辛易之代表市委就“八一五事件”作检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近千人到会“造反”，控诉在南岸等地继续发生围斗八一五派学生事件，要求市委立即出面解围，并公开登报、广播承认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是革命组织。市委当然无法满足造反派师生的要求。9月4日，重大、师专等校千余八一五派师生在师专宣布“绝食”，要求市委停止组织群众围攻八一五派师生。在“绝食”10小时得不到市委答复后，9月5日凌晨，众师生步行前往市郊茄子溪火车站阻拦列车，强行搭乘上京“告状”。当晚7时搭上铁路方面增派列车赴京，在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检阅“百万革命小将”中得到“接见”。

这就是当时重大、师专等校为什么有大批师生都离校北上了的真相。如果陈先生的日记确是在当时记的，难道留在重大的那些学生竟不会向他们介绍这样重要的“本地新闻”？很难想象，一个当时属于八一五战斗团的造反派学生，在向外地学生介绍重大情况时，竟会不提“八二八，扯头发”（保守派炮制的传单诬称重大八一五把一个女教师扯光了头发游街，谣言被揭穿后成为笑柄），竟会不提“九三”、“九四”、“大绝食”，竟会不提“拦车上京告状”（当时八一五派都宣称是由“周总理派专车接上北京”，何等荣耀）……

陈先生在9月14日日记中说的“现在8·15兵团已经夺了重庆大学的党政财文大权，成为重庆市造反精神最强的队伍，连重庆兵工厂那些保皇派组织，现在也不敢跟他们公开作对。”

这就更近乎于天方夜谭了。

重大八一五是什么时候开始夺学校的权？是在一个多月之后的10月19日。这天上午，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对学校广播站、印刷厂、电话总机等要害部门实行夺权，并到校长室夺走校印……为此，重大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还发出了抗议传单。

当时的重大八一五，已经到了“连重庆兵工厂那些保皇派组织，现在也不敢跟他们公开作对”的地步吗？这也显然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当时，重大八一五大批师生已经北上告状，留下来的人许多都受到打击迫害，一度不敢公开上街，上街也不敢公开亮明重大学生的身份。那是重大八一五最艰苦的时期。而由党政领导操纵、组织的保守派队伍却处于极盛时期。

9月3日，经重庆市委建议，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文化宫召开代表大会，宣告成立。同日，重庆大学赤卫军将已调离重大的前党委副书记宋殿宾及其妻张道臻抓回学校，挂黑牌，戴高帽，在风雨球场批斗，并把邓时泽（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正荣（无线电系党总支副书记）、贺学洪（冶金系党总支副书记）、王德伦（教务处副处长）等抓到会场陪斗。

9月5日，按照中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部署，工人纠察队在首家试点单位中梁山煤矿宣告成立。

9月6日 中梁山煤矿工人纠察队500余人由书记、矿长带队，乘11辆卡车到市区游行示威。，随即，全市性的工人纠察队总部成立。总部负责人就是重庆大学汽车班班长楚光辉。

9月7日，李井泉在重庆召开学生座谈会，提出要把八一五战斗团和赤卫军中的红五类分出来组织统一的红卫兵，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组织起来，就可以在十天半月内取得优势，压倒八一五战斗团。会后，李井泉指示重庆市委，要号召工人阶级动员自己的子女参加红卫兵，工人学生要进行阶级回忆对比教育。同日，李井泉在重庆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召开重庆市50多家大型工厂党委书记会议，布置组织工人纠察队对付造反派红卫兵。

9月8日，在市委授意下，由市学联出面串联，选拔“红五类”子女组建的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成立，总部设在五十四军军部对面坡上的红岭（即鹅岭，“文革”中改名）公园。五十四军军长韦统泰、政治部主任梁大门奉命担任“辅导员”，并派来解放军联络员10人。随后，市委号召各单位发动“红五类家长”踊跃“送子参军”（即送子女参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重庆日报》进行大肆炒作，全市掀起“送子参军”热潮。

9月10日 《重庆日报》头版报道老工人陈荣森、老贫农简阳卿等36人向全市红五类家长发出倡议《立即掀起一个鼓励子女参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热潮》。并报道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举行接受新战士入伍大会……

在陈先生一行到重大串连的9月14、15日这两天，重庆是什么形势呢？

9月14日，按市委安排，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召开誓师大会。五十四军军长韦统泰、政治部主任梁大门，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和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孙先余、廖苏华等出席大会。鲁大东代表市委发表热情讲话。

9月15日，《重庆日报》按市委指示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全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举行誓师大会》，并配发社论《热烈欢呼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长壮大》。

这就是当时的形势。重大八一五这时并没有在全市占上风，这时占上风的还是保守派。还需要提到的是，当时重庆的保守派并非如陈先生日记中所说以兵工厂为主，当时声势浩大的工人纠察队，主要是由市内一些工交、机械企业中的“革命职工”组成（市委工交政治部和基建政治部、国防政治部在具体抓这项工作），兵工厂当时也有工人纠察队，但为数甚少，影响不大，因为当时国防工厂还没有完全摆脱“保密单位”的状态，还没有“杀向社会”。

再来看看书中的另一处明显错误。

这是陈先生1967年5月6日的日记。这天晚上，陈先生在北京大学，“正准备睡觉”，有同学送来了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中央撤销了李井泉的职务，组成以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为首的省革筹组。同学曹卫东说：“梁兴初原来支持‘红成’，刘、张两口子一直支持‘8·26’，他们各自支持一派，让四川两大派长期武斗，张国华整天和稀泥……”之后，陈先生“刚刚熄灯入睡……新北大公社总部广播通知，说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下达后，四川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两派互相开枪开炮，动用了坦克和手榴弹，牺牲了不少红卫兵……”（322—323页）

这又是一则天方夜谭！

陈先生在“整理”日记时，居然都没有查一查当年那个“红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红十条”是哪天公布的？是1967年5月7日。5月6日就有了“红十条”吗？不可能有，因为“红十条”中的第十条，是5月6日夜里“无产阶级司令部”得知当天成都发生了武斗流血冲突后，才临时补上去的对“五六”事件的处理意见（若没有发生这一事件，就只有“红九条”）。而“红十条”任命的四川省革筹组负责人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都还没有到四川省的省府成都去走马上任，还在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梁兴初是从广州军区调来的，张国华是从西藏军区调来的。他们都还没有踏上四川的土地，怎么能出现“梁兴初原来支持‘红成’，刘、张两口子一直支持‘8·26’，他们各自支持一派，让四川两大派长期武斗，张国华整天和稀泥……”还没有发生的事提前出现在日记中了，岂非咄咄怪事？

陈先生大概只记得当时成都发生了两派武斗，但却弄不清楚是哪两派武斗。实际上，当时成都发生的武斗（即“五六”事件），是造反派（包括红成和八二六两派在内）与保守派产业工人战斗军之间的武斗，造反派要强行进入国防工厂一三二厂去支援该厂处于劣势的造反派，被该厂占绝对优势的保守派产业军阻挡，产业军人员并且以“护厂”的名义向强行冲进来的造反派开枪，发生了流血事件……

陈先生在5月6日晚上就听到“广播通知，说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下达后，四川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两派互相开枪开炮，动用了坦克和手榴弹，牺牲了不少红卫兵……”这当然也是天方夜谭。5月6日晚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还没有最后形成，自然也不可能“下达”，也就说不上“决定下达后，四川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至于陈先生所说的“两派互相开枪开炮，动用了坦克和手榴弹”，这是后来7、8月间的事了，那是造反派两大派之间的大规模武斗，与5月初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武斗不是一回事（重庆国防工厂的坦克开出厂，第一次是在7月底）。上述文字，显然是陈先生“整理”时想当然的添加。

据陈先生在前言中说，有专家对这部日记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其中一个评价是称之为“一部中国文化大革命百科全书”。我想，若是一般的虚构小说或戏说式的文艺作品中出现上述问题，其负面影响还不会太大，而出现在“百科全书”中，其误导读者的后果就不能不令人担忧了。

日记，应该属于历史文献。历史文献的价值，就在于其内容比事后的回忆更真实。但是，我们这几十年来，似乎已经形成对历史文献按不同需要进行“整理”的传统。这就不能不使历史文献的价值大打折扣。

此外，《红卫兵日记》一书为了便于读者理解那段历史，加了些注释，这是很有必要的。不过，全书第一页上的第一条注释“四清运动”就出了个不应有的错误，注释中说：“四清，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陈先生在这里，用的是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中的提法，但这个提法后来改变了，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已经在第三条“统一提法”中明确提出：“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从陈先生的日记可知，他在“二十三条”下达之后的1966年5月还在农村搞“四清”，不会不知道“二十三条”。陈先生如果记不清楚了，随便查查有关历史资料或找有些老干部打听一下，都可以把这条注释写得更准确；还有322页上的注44，把“8·26”说成是“四川大学红卫兵8·26造反兵团之简称”，其实川大八二六的全称是“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又把“战斗团”错记为“兵团”了）；547页上的注释，把“文革”中众所周知的“七二一道路”说成是“7·22道路”。这些，显然都不合于“百科全书”的要求吧？

当然，陈先生这部日记，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在9月14日到重大串连那则日记中记载的“北大学生每月伙食标准15.5元，重大学生每月伙食标准12.5元，他们的伙食却比我们好多了”，这一句话的价值就足以胜过那些添加“整理”的文字），笔者尚未读完全书，只是在选读到几处内容时发现了一些问题，并不等于全书处处都有这样的问题。不过，这毕竟是一种令人遗憾的缺陷。这一缺陷必然会影响到读者对全书的信任度。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